

课余生活，提高了我们的文化艺术素养，令我至今难忘。

说来也巧，在我从清华建筑系毕业 28 年后，女儿张镒鸣也考进了清华建筑学院建筑系，并且同样加入了清华军乐队，吹黑管，她的入门老师还是周乃森先生。那时周先生大约已经是我现在这把年纪了，还在教管乐班学生，真是宝刀不老啊！周先生 1953 年到清华音乐室任管乐专职教授，一生培养了大批学生，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周乃森先生生于 1918 年，2004 年逝世，享年八十有六，去世后清华为他立了铜像纪念。

回想 1995 年我们清华建筑系 1965 届毕业生 30 年之际，校庆日那天全班七十多人齐聚清华园。我们几个老军乐队员特意去音乐室拜会了周乃森先生。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神采不减当年。那年校庆，一帮年轻的清华军乐队员们在礼堂前奏乐助兴，碰巧女儿也在乐队中，我这当老爸的当然十分得意，并把她介绍给我们建五军乐队老队员们，一起照相留念。

这一晃又二十多年过去，我们这帮老吹鼓手也都垂垂老矣。呜呼，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016 年 4 月 4 日

1949—1953 年外语系教学和生活点滴回顾

○ 聂雅真 王明珠 祝秋生 孙亦丽 蒋 云（1949 入学外文）

我们于 1949 年 9 月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系主任是吴达元老师，迎接我们新生的老师有严宝瑜，他常带着大家在清华图书馆前唱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高楼万丈平地起……”

为了庆祝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女生集体学习扎制五彩纸花和纸糊红五星彩灯，供游行之用。从此，每年五一节和国庆节清华学生都在前一天半夜 12 点拿起馒头咸菜，集合后走到清华园火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下车后步行到和平门外某学校集合待命。天亮后，进入东华门附近指定地点，等待 10 点钟开始的游行检阅。游行队伍走到西单后折回到和平门外某校吃干粮、休息，下午五六点再到天安门广场联欢，

唱歌跳舞。晚上 10 点以后列队到西直门乘火车到清华园火车站。回到学校一般是后半夜了，食堂会供应夜宵——稀粥。第二天休息不上课。当时一点不觉累，心中充满自豪的激情，因为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2 年院系调整后，我们到了新北大，条件大为改善，来回可以乘坐大巴。

在学习方面，有全校性的必修课“社会发展史”，讲课的老师有当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还有费孝通、吴晗等老师。刚进校时，外语系只有英语专业，清华的英语传统课程是 Prose and Poetry（散文与诗歌）。课本是从图书馆借用的美国原版书，用毕归还。赵绍熊先生教英语散文课，

□ 母校纪事

讲课表情十足，他的知识面广，善于在课外热心解答问题。徐锡良先生教会话课，他为人善良热情，还请上海来的南方学生学包饺子、吃饺子。这段情节后来成了多年来口语教学中的一个内容。

美国教师 Mr Rikette 教语言学，他的夫人 Mrs Rikette 教语音课。上海男同学玩了个恶作剧，四人身穿长衫，故意迟到进课堂，引起全场轰动。Mrs Rikette 只是友善地一笑了之。他们夫妇俩在 50 年代因有特务嫌疑被捕入狱，后获平反回国。杜秉正先生教翻译课，他说话有口音，但他讲翻译的三难，即信、达、雅的重要性和信、雅两者的矛盾如何解决，对提高翻译能力很有帮助。他对英国诗人拜伦也颇有研究。马约翰先生教体育课，他当时已是花甲之年，身穿一身白色衣裤、白球鞋，精神抖擞，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每次上课先要学生跑圈，他在下面看着，见到有人跑

不动想偷懒时，他就举着双手用英语大喊“Run! Run!”受到他的激励，大家接着坚持跑完规定的圈数。下午，学校要求学生走出教室、图书馆、宿舍到操场参加各种活动，如转铁圆环，训练飞行员的基本动作。清华学生在全国劳动卫国制通过率评比中是名列前茅的。聂雅真当过文体委员，工作积极主动，经常在节假日组织舞会。她还当过女生篮球教练，效果不错。蒋云是军乐队小号手，每天早晚为升降旗吹奏乐曲，随校军乐队参加国庆游行。祝秋生是一名长号手，随军乐队加入北京市仪仗队参加过游行，邮局曾将此场面做成了纪念明信片。

在清华上二年级时，我们被分成两班，分别由李赋宁、杨周翰老师执教。很多同学清楚地记得杨周翰老师把教案重点写在恒大牌软包装烟盒背面，上完课就把它一揉扔掉。每次批改完学生作文后，还要让学生轮流去他办公室，一对一地就作文的构思、语法错误、用词不当等问题提出意见，使学生受益匪浅。

总的印象就是课程设置比较多样化。除英语语言文学课外，鼓励学生自由选课，选修课较多，如王亚南老师的“政治经济学”，还有罗念生老师的“希腊、罗马神话”，雷海宗老师的“世界通史”，王瑶老师的汉语课，杨绛老师的狄更斯作品选读等。还有第二外语俄语、法语，但是上课纪律较宽松，常有人逃课。如王瑶老师点名提醒某学生如不上课可退选除名，后来该生去上课听到老师讲鲁迅的“救救孩子”后，他认为老师也救了他。

从上海来的几个学生常在一起玩，



入学清华不久的同学合影，左 3 为孙亦丽学长

不好好念书，被称为“上海小圈子”，惹来不良看法。后来，他们在党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下都有了进步，有的加入了共青团，有的加入了共产党。第一个学期后的寒假，1950年初，孙亦丽和王明珠自愿报名参加一个月的京郊土改运动，体验农村的生活。当时只能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大多数人家有地窖，大白菜是必备的菜，还有大葱蘸酱，主食有白薯、榆树皮和面做的馍，窝窝头，偶尔吃到贴饼。孙亦丽因为刚从上海来到北京，特别怕冷，她全副武装，个子瘦小的她身穿大棉袄、棉裤，头戴大毛皮帽，远处走来都看不清脸，同学开玩笑地说是“小皮球来了”。参加村里斗地主的会，看到农民翻身做主人，对一个从上海来的“小姐”触动确实不小。当时，聂雅真是学校和土改工作组之间的联络员，三两天就下去一次，也有不少体会。接着“抗美援朝”开始，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各社团开展活动，如合唱队、舞蹈队、管弦乐队、话剧小品、快板、拉洋片等下乡宣传。王明珠还在农村扮演过一位遭受地主婆迫害的妇女。1951年有三反、五反运动，孙亦丽被抽调去参加了工作，有时任务紧急，通宵不能睡，实在困了就用冷水洗洗脸，在拼起的三张凳子上休息一下。

1951年6月，“抗美援朝”开始后，一位将军来清华作报告，说美军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们安能坐在平静的书桌旁？他号召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全场热烈响应，王明珠也积极报名参军。就这样，她作为唯一的女生和11位男生一起被选拔为清华大学第一批抗

美援朝的学生兵。于是，在众人的簇拥下被热情地抬出清华大礼堂，开始了她的从军生涯。

1952年上半年，孙亦丽、聂雅真、戴声浦等被抽调去参加在京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任生活翻译。

1952年院系调整，1953年2月，蒋云、施承训和三年级的李星建被抽调去朝鲜后方碧潼美军俘虏营任翻译。后来朝鲜停战谈判即将签字，新北大已停课准备毕业考试，外交部先后来校抽调1949级学生孔繁农等14人去做停战后的翻译工作。

我们1949年入学读完一个学期后，配合当时学苏的形势，学校号召学生自愿报名可改学俄语、法语。不报名的可继续学英语。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的西语系（英、德、法、西班牙）由清华、老北大、燕京、师大、辅仁五校的西语系合并而成。合并后英语专业共有学生108人，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如施咸荣可以独立研究英国文学，已有翻译作品问世，



清华百年校庆校友返校时，彭克巽（左）、孙亦丽（右）代表1949级同学向清华外语系系主任刘世生老师赠送水晶帆船

还可给别的同学辅导老师讲过的课程。我们108人分成ABCD四个班,分别由赵绍熊、李赋宁、赵筭蕤、杨周翰四位大将担任主讲精读课,教材是自选的,大多是选自英、美、苏的报刊文章,由打字员打印。老师编的教案非常详尽,编的词汇我们称之为“开花式”的,根据不同词类用法分别编写例句,内容丰富,切合实际,使学生得益匪浅,很多人一直把这些宝贵的资料保留到纸发黄、发脆、掉渣。孙亦丽还保存着祝秋生寄来的邮包,内有他做学生时的练习作业,上面有老师的亲笔批改。

这些认真敬业的教学传统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年轻接班人。除了精读课,还有泛读、口语、翻译,少量的文学课。美国教师 Mr Winter 从清华到北大执教 50 多年,学问渊博,深入浅出,善于用最简单的英语讲出深奥的道理,他教萧伯纳的《卖花女》时模仿剧中不同角色的语音语调,表情惟妙惟肖地表演,精彩之极,令人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四年级的翻译课老师是朱光潜。他造诣深,要求严谨,讲解类似字词的差别,解析同学作业的优缺点,提醒我们译完东西不要丢在一旁不管了,重要的地方还要继续琢磨,说不定某一天突然来灵感,会想到好的译法。赵筭蕤先生也是一位学问渊博、热心教学、一丝不苟的好老师。李赋宁先生深受清华和北大的学生爱戴,他治学严谨,知识面广,英语地道,在北大担任系主任期间提出教授和青年教师一对一配对培养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作罢。

我们刚入清华时,清华的食堂办得是挺不错的。每年寒暑假前给学生打一顿牙

祭,满桌菜,还供应白酒。常吃的主食是红白高粱米饭,少量馒头。有校医院证明的病号,可以吃馒头。女生宿舍楼下有小卖部,卖零食,如烧饼、猫耳朵、蜜麻花、花生米、炸鸡蛋等。一包花生米才卖2分钱。男生宿舍旁边有山东小饭店,供应家常菜,给学生增加不少乐趣。有的还可赊账,个别人毕业时都没还清。

现在北大百年大讲堂的原址是大饭厅兼会议厅,开大会时大家拿着凳子去。生活平常而愉快,1952年每月国家发伙食费12.8元,米饭、馒头、粗粮都有。食堂有大小食堂之分,小食堂是私人办的,后因经营不善关门了。西语系学生住的宿舍原址大约在现在的理科楼群附近,是矮小的房子,大统仓,进门分三个隔断,隔断上方是通的,每个隔断里放四张上下铺双层床。睡在上铺的可以看到隔壁,这边看报翻页,隔壁能听到,若有人打呼噜,更不用说了。

1953年我们毕业时剩下103人,由于当时英语不吃香,毕业分配不理想,很多学生是学非所用的。除极少数被分配到外交部、商务部、对外友协、中联部等大单位外,大部分改行去干各式各样的工作。我们系有5人因北大急需补充年轻人搞行政,被学校提前在1953年5月分配到总务处、教务处、图书馆、校医院、留学生办公室等处工作,他们为北大做出了平凡而宝贵的贡献,还有很多人被分到北京以外的省市做杂活。103个毕业生中,最终有在联合国退休的1人,在高校当教授的3人,在外交部退休的8人,在中联部退休的3人,还有自主创业获得成功的1人。